

编者按 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深刻重塑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东南亚研究从西方垄断向多元知识生产主体共存的态势演进。当下的东南亚处于大国博弈前沿,在政治、经济、贸易、产业链等领域的地位日益凸显,东南亚研究对全球的重要性已超越单纯的区域性知识层面,为理解世界、地区和国家的变迁提供重要视角。因此,要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需将其置于更长远、更广阔的历史与学术脉络中审视。那么,国内东南亚研究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有哪些特点与特色领域?相比国际学术界,中国的东南亚有哪些优势与不足?未来的努力方向是什么?为此,本刊特邀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研究助理李优博士,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翟崑教授进行专访。翟崑教授长期研究东南亚及亚太问题、“一带一路”和区域国别学等领域,代表作包括《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第三个奇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及展望》《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等,译著有《东盟奇迹:一个充满活力且真实存在的现代奇迹》。

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翟崑教授访谈

翟 崑 李 优

一、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脉络

李优(以下简称“李”):翟教授您好,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翟崑(以下简称“翟”):中国与东南亚陆海相连,交往密切,对东南亚的研究源远流长,自成特色。先简单介绍一下早期的东南亚研究。古代中国称东南亚为“南海”“南洋”,《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中国古籍对此均有所记载。由于地理相近,中国传统的南洋研究或“南洋学”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但古代的“南海”或“南洋”,并不能被简单视为“东南亚”的同义词,因为其更近似于朝贡体系与“化外之地”发生重叠的地方,其边界是模糊的、流动的。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南洋学”主要聚焦两个领域:一是南洋交通史。探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交通往来,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记载“南洋”地理范围,“东起吕宋[今菲律宾],西达印度西岸”;^①二是南洋华人。20世纪初,梁启超依据中国本土史料编写《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这八位伟人均在东南亚各国担任过国王的华人。^②1912年,北京大学最早开设《南洋各岛史》课程。两年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出台《大学规程令》,其设计与北京大学1912年所订的“民国元年大学制及其学科”完全一致,其中包括《南洋各岛史》。暨南大学作为民国时期的“华侨最高学府”,是当时南洋研究的中心。1927年,著名爱国华侨教育家刘士木参与创办的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是近代中国最早专门从事东南亚研究的机构之一。

冷战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影响非常显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研究服务于外交斗争、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需求凸显。20世纪50年代,有关东南亚研究的刊物陆续出现。1956年,厦门大学出版《南洋问题资料》;1959年,暨南大学出版《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主要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的成果,内容多为东南亚的经济贸易、工业化、农业生产等,也涉及美国、苏联、日本等大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及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此外,《世界知识》《国际问题研究》和《世界经济文汇》等刊物也发表东南亚研究的文章。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逐渐摆脱对抗状态,东南亚研究更客观中立,服务大局。1983年,金德湘发表文章系统回顾1967—1983年东盟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及面临的挑战。^③在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轨的背景下,这篇文章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快速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厦门大学成立中国东南亚研究会,这是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东南亚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一批新的东南亚研究学术刊物陆续创刊,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提供了稳定的发表渠道,如1974年创刊的《南洋问题》(1988年更名为

①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页。

② 王向远:《从东方学史看中国“南洋学—东南亚学”的成型与转型》,《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176—184页。

③ 金德湘:《东盟十五年的回顾与展望》,《现代国际关系》1983年第4期,第7—14页。

《南洋问题研究》),1980年创刊的《印度支那研究》(1990年更名为《东南亚纵横》),1983年创刊的《东南亚》(2018年更名为《南亚东南亚研究》)。中国对外交往的突飞猛进催生了一批综合类的国际问题研究期刊,其内容均涉及东南亚研究。1991年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东南亚地区形势从战争走向和平,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总体提升,大大刺激了我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可以说,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演进是南洋学历史积淀、外部国际环境影响与国家战略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

李:聚焦到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主要经历了哪些阶段,取得了哪些进展?

翟:进入21世纪,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随国运与世势而动,演进脉络清晰,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东南亚研究的议题拓展与国际化发展阶段(21世纪初至2012年左右)。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拓展研究议题的同时,开始主动对接国际学界。外交学院、云南大学、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成立与东南亚有关的学院或研究机构。国内东南亚研究议题不断拓展。在传统优势领域,如华侨华人研究、东南亚史研究持续深化,代表作有吴凤斌的《东南亚华侨通史》、曹云华的《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朱杰勤的《东南亚华侨史》、梁英明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东南亚近现代史》《东南亚史》等。在新兴研究领域,热点议题迅速多元化,如东盟区域合作研究、东南亚国别政治经济转型、非传统安全等。

中国学者对东南亚的研究愈发全面深入,涌现出一批理论性较强的学术专著,如王正毅的《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贺圣达等的《走向21世纪的东南亚与中国》、王士录与王国平的《从东盟到大东盟:东盟30年发展研究》、曹云华的《新中国:东盟关系论》、郑先武的《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王子昌的《东盟外交共同体:主体及表现》等。此外,张锡镇主编的《当代东南亚政治》、刘稚主编的《东南亚概论》,以及祁广谋和钟智翔主编的《东南亚概论》等教材相继出版,丰富了东南亚研究的教学资源和广泛传播。

这一阶段国内外学术加速接轨。一批国外经典著作陆续翻译出版,为学界提供了东南亚新资料,拓展了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视角,中国东南亚研究更加多元化、国际化。这些著作包括:2001年程立显、刘健翻译的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2003年贺圣达等翻译的《剑桥东南亚史》,2004年王正毅、冯怀信翻译的阿米塔·阿查亚的《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

与地区秩序》，2004 年中国大陆引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2007 年张锡镇等翻译的约翰·芬斯顿的《东南亚政府与政治》，2012 年甘会斌翻译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比较的幽灵》等。同时，中国政府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等各种渠道，派送大量中国学者和研究生等赴美、欧、日、澳及新加坡等国家长期学习调研，大力支持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智库对话、公共外交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学术网络建设。

第二,东南亚研究的战略驱动与学科建设期(2012—2022 年左右)。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进一步嵌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一方面,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学界研究重心快速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别研究、^①互联互通、^②产能合作^③等议题倾斜;另一方面,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南海问题与南海权益维护成为“显学”。^④ 吴士存的《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南沙争端的由来与发展:南海纷争史国别研究》、新华社国际部出版的《南海文明图谱:复原南海的历史基因》、朱锋主编的《南海周边安全形势分析》等著作,从历史、法律、地缘政治多维度,有力论证我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以及外部大国干预对地区稳定造成的严重破坏。

东南亚学术机构建设在这一时期也迎来高峰,研究主体迅速扩大,多点开花。在传统研究机构方面,有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高校和老牌政策研究机构。在南方,有暨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和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构成的“三校两所”等传统重镇。在新兴研究机构方面,2014 年,外交学院将 2004 年成立的东亚研究中心更名为亚洲研究所。全国范围内成立了一批东南亚研究机构,如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2010 年)、浙江工业大学越南研究中心(2012 年)、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东南亚南亚西亚研究中心(2012 年)、贵州大学东盟研究院

① 李晨阳、宋少军:《缅甸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反应》,《南洋问题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20—30 页;吴崇伯、张媛:《“一带一路”对接“全球海洋支点”:新时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进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第 98—108 页。

② 李晨阳:《中国发展与东盟互联互通面临的挑战与前景》,《思想战线》2012 年第 1 期,第 87—90 页;古小松、杨超:《高慢低快:2012—2013 年的东南亚经济——兼谈中国—东盟经贸关系》,《亚太经济》2013 年第 2 期,第 16—22 页;王玉主:《区域一体化视野中的互联互通经济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 年第 5 期,第 17—29 页。

③ 吴崇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盟产能合作研究》,《南洋问题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71—81 页;赵东麒、桑百川:《“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基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6 年第 10 期,第 3—14 页;陈慧:《“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产能合作重点及推进策略》,《经济纵横》2017 年第 4 期,第 42—47 页。

④ 宋燕辉、鞠海龙:《南海问题分析与预测(2010—2011)》,《东南亚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49—54 页;刘阿明:《两面下注与行为调整:中国—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模式研究》,《当代亚太》2011 年第 5 期,第 57—72 页;祁怀高:《近年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面临挑战及因应之策》,《国际论坛》2018 年第 1 期,第 8—13 页。

(2013年)、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2014年)、四川大学缅甸研究中心(2018年)。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呈现“三多”发展态势,即研究机构多、研究人员多、研究成果多。

中国东南亚学界基本摆脱依赖翻译、加工的研究模式,转而强调原创性与务实成果。《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研究》等国际关系领域优秀期刊,既发表西方前沿理论与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和应用^①,还有基于亚洲本土经验与实践的理论洞见。^②在著作方面,研究议题进一步细化,对区域史、宗教、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关注度显著上升。代表著作包括:陈元中的《东南亚政治制度》、蒋满元的《东南亚政治与文化》(2012年)、古小松的《东南亚:历史、现状、前瞻》(2013年)、郑筱筠的《东南亚宗教研究报告》(2014年)、贺圣达的《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2015年)、吴杰伟的《东南亚宗教艺术研究》(2019年)、郑维宽的《东南亚区域史》(2022年)、查雯的《迟到的东南亚》(2022年)等。

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对东南亚国别国情、投资环境、法律体系等微观和应用性研究的需求急剧增加,与东南亚相关的区域国别系列丛书迅猛增长。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动“列国志”系列丛书修订工作,陆续出版以东盟国家为主题的卷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蓝皮书”“黄皮书”等皮书系列聚焦特定国家或区域的年度性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在区域层面,2014年起叶兴艺、庄国土主编的《东盟发展报告》,2015年以来王勤主编的《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2017年起卢光盛主编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报告》(后更名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发展报告》)等。在国别方面,2011年李晨阳主编的《缅甸国情报告》,2015年起先后由古小松、谢林城主编的《越南国情报告》,2019年起由苏莹莹和翟崑主编的《马来西亚发展报告》等。

第三,东南亚研究的新学科赋能与范式革新期(2022年以来)。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为东南亚研究注入新动能,推动研究范式向更深层次的跨学科整合与知识生产自主化迈进。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同年9月,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东南亚研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获得国家支持和制度保障。

^① 《东南亚的“区域治理”及其效果》,《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第28—34页;王玉主:《对冲策略及对中国—东盟关系的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期,第20—50页。

^② 郑先武:《万隆会议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世界政治与经济》2015年第9期,第31—58页;李晨阳:《中国东南亚政治研究的反思与建构》,《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134—148页;魏玲:《关系平衡、东盟中心与地区秩序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7期,第38—64页。

东南亚研究更强调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旨趣从单一国别议题转向更具“跨界性”的议题。例如,次区域合作与跨境河流治理、^①跨国产业链、^②数字丝绸之路与数字治理^③等。一些专著向细分化、纵深化和系统性研究发展,如刘军的《东盟认同过程研究》(2022年)、郑先武的《开放的区域建构: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与演变:1945—1967》(2023年)、李峰的《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1945—1967)》(2023年),以及范宏伟等主编的《近代南洋华侨教育史料汇编》(2024年)等。一些新兴领域议题的著作,如黄红春的《艺术介入空间:中老铁路沿线站点环境设计探索》(2024年)、姚永坚等编著的《东南亚区域地质与油气地质》、柯颖等著《数字赋能未来:中国—东盟数字产业合作研究》(2025年)等。

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不再满足于简单应用或验证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而是明确提出要致力于构建“东南亚研究的中国范式”。^④这种理论自觉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独特性提供更具原创性的理论阐释。^⑤比如,中国学者对义利观、亚洲价值观、亚洲安全模式、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政策概念进行学理化辨析,并提出“东盟世界”“和合共生”等新概念和新分析框架。

中国东南亚研究界的学术共同体意识更加突出。除了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等传统的学术团体之外,国内各种与东南亚有关的,或松散或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比如,清华大学举办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自2008年创办以来,每年都会聚集一批中青年东南亚研究者,长此以往,其培育效果成效显著。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以来,各区域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加强,组织分领域的研讨会、年会、创办新的期刊和集刊,从整体上推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等。近几年来,复旦大学中国—东盟学者对话会、厦门大学东盟研究中青年论坛、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论文工作坊、郑州大

① 李一平、李峰:《多层区域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与“澜湄合作”安全竞合关系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115—128页;张超:《河流法律人格在澜湄合作跨界水资源治理中的适用》,《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第134—154页。

② 吴崇伯、吴雨禾:《东盟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与路径》,《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3期,第1—22页;张龙飞、郭树勇:《东南亚半导体产业的网络性权力构建》,《亚太经济》2025年第5期,第193—208页。

③ 罗圣荣:《东盟数字经济与中国—东盟“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当代世界》2023年第3期,第59—65页;姜志达、韩卓希:《中国—东盟数字创新合作的态势与路径选择》,《南洋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71—84页。

④ 翟崑:《区域国别学规范性与我国东南亚研究的“学用相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第13—20页。

⑤ 詹欣、杨国君:《中国共产党党外交义利互构探赜:以改革开放以来对东南亚国家政党的交往为实证》,《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5年第5期,第1—24页;吕耀东等:《“亚洲价值观”与中国周边外交实践路径探析》,《东北亚学刊》2025年第4期,第1—21页;郑先武:《亚洲安全模式的规范内核与制度创新》,《当代世界》2026年第1期,第50—56页。

学的中国(河南)—东盟国际学术会议等国内国际会议逐年举办。在国别领域,截至2025年底,云南大学主办的缅甸年度形势与中缅关系研讨会已举办15届,见证了好几代缅甸研究人才的成长。

总的来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背靠国家,取得很大进展,值得肯定。此外,东南亚学界“老中青、传帮带”的代际传承比较有序,日趋走向有组织科研,学术生态较为良好。

二、如何看待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李:东南亚地区在民族、宗教、语言等维度上多样性突出,这导致不同学者在考察该地区时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或研究范式。我国东南亚研究领域的学者主要有哪些研究取向?

翟:中国研究东南亚的学者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专门研究某个国家的国别专家,第二类是研究整个东南亚地区或东盟的区域专家,第三类是国际关系学者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三类学者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国别专家使用的研究方法较为多元,既来自人文社科甚至是理工农医等各种学科,其研究旨在对单一国家进行系统深入的剖析,使研究者得以对单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形成深入细致的把握。然而,他们彼此缺乏对话,研究碎片化现象较为突出,不利于不同国家研究之间的交流对话。这主要是因为早期部分高校在研究任务分配方面更侧重于专而非全。^①区域专家的研究方法主要来自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学、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学等学科,还有学者运用世界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尝试对区域史或区域关系性特征进行整体性描述。东盟专家就是该类学者的典型,他们主要关注地区整体格局,从国际角度审视东盟的整体发展趋势。此类学者对地区整体格局有较为宏观的把握,但对国别的微观和具体问题没有国别学者精通。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善于从全球角度看待东南亚,将东南亚地区、东盟作为研究案例,或从前两类中汲取灵感进行理论建构。但由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理论,部分学者没有完全打开国家内部的“黑匣子”。三类学者间有明显的互补空间,可以相互借鉴。国别专家可借助区域专家的整体视角与模型分析工具,更全面地把握特定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位置与作用;区域专家能吸收国别专家的细致研究成果,丰富并修正自身对地区互动和整体格局的认知;结构视角的学者通过与前两派交流,能更好地将全球视角与具体

^① 王宣、吴宏娟:《栉风沐雨终不悔 热血丹心谱华章: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部分专家访谈录》,《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6期,第18—25页。

国别、区域问题相融合,推动宏观研究迈向更高水平。总的来说,能把三类研究集成统合的学者还比较少见。

李:您认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取得了哪些独具特色研究成果,拓展了哪些研究领域?

翟:目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已形成若干特色鲜明、积淀深厚且持续迸发新活力的重点领域,体现在以下五点:

1. **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这是中国东南亚研究最具历史底蕴和特色的领域之一。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区域与国别专家持续深耕,该领域已超越早期侨乡联系、移民史的范畴,向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网络纵深拓展,还有一些研究项目获得国际知名学术基金的资助,这进一步说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该领域的研究是非常认可的。^①当下重点研究议题包括:新华人华侨的跨国实践与身份认同、^②华商网络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协同、^③华人社团的转型与在地融入、^④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⑤等。这些研究充分借助中国在侨务资源与文献(涵盖侨批、族谱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搭建起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坚实平台,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政策相关性。中国在该领域的优势积累有二:一是海内外华人华侨同根同源,关注他们的移民史、风俗、生活状况、政治与社会地位,以及和祖国的联系,本就是中国学者的兴趣所在。二是政府机构如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大力支持华侨华人研究,搭建学者和官员之间的常态化沟通桥梁。不过,我国的华人华侨研究也面临挑战。有学者认为,华南地区部分高校原本在这个领域里有特色的研究机构因学科调整转向国际关系方向,导致中国的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现在遇到一些结构性瓶颈,包括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的平衡难题,以及区域国别学发展路径的探索挑战。^⑥

2. **东盟区域合作与中国—东盟关系研究**。这是 21 世纪以来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由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所驱动,研究议题具有鲜明的战略性和实用性。无论是国别专家、区域专家还是国际关系学者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者,都高度关注该

① 庄国土:《中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历史、现状与前景——庄国土教授访谈录》,《东南亚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88—91 页。

② 张淑雯:《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基于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东南亚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134—152 页。

③ 任娜、刘宏:《“一带一路”构建中的东南亚华商网络研究:以新马菲商会组织为中心》,《世界民族》2021 年第 4 期,第 99—111 页。

④ 张媛:《当代东南亚华人舞蹈社团的类型、特点及功能》,《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4 年第 4 期,第 87—95 页。

⑤ 林瑀欢:《东南亚华校的三语教学:趋势与方向》,《全球教育展望》2021 年第 10 期,第 85—102 页。

⑥ 《四校齐聚鹭岛,共探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新路径》,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2025 年 10 月 2 日,https://nanyang.xmu.edu.cn/info/1021/34961.htm,2026-02-10。

领域的发展。他们从外交战略、经贸合作、互联互通、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等多个维度,深入分析中国—东盟关系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前景。^① 研究覆盖面特别广,政治安全层面,聚焦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②东盟方式(ASEAN Way)的特点与效能、^③南海问题上的东盟角色^④与中国—东盟合作^⑤等。经济层面,研究覆盖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可行性论证到升级谈判的全过程^⑥,并延伸至东亚合作,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⑦互联互通、^⑧跨境经济走廊建设^⑨等前沿议题。该领域的研究具有极强的政策导向性和现实时效性,产出大量评估报告、政策建议和学术论著,为中国—东盟合作的深化提供直接智力支持。

需要说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需要兼顾东南亚与东盟之间的辩证关系。东南亚各国在民族、语言、宗教和社会政治制度、外交政策等方面差异极大,而东盟作为该地区最核心的组织,却是一个整体性的“上层建筑”。若过度强调东盟的统一性,或许会忽视各国对东盟的不同态度以及它们在东盟框架之外的外交活动。若过度强调东南亚国家的多样性,或许会低估东盟在区域合作与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我们不能将东盟完全等同于东南亚。东南亚还存在美国同盟体系,“一带一路”国家、澜湄合作机制等与东盟联系紧密却相对独立的机制。实际上,东盟研究与东南亚研究在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上已展现出清晰的分化轨迹。东盟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治理问题导向”,其理论关注点聚焦于东盟组织本身的制度设计、决策过程、区域合作机制、共同体构建等议题,在方法论上更倾向于借鉴国际关系理论、制度主义、比较政治学等学科框架,并追求理论与案例的结合。东南亚研究的核心关切涵盖社会、文化、历史、地理、民族等更广泛的领域,强调

① 冯子剑、宋德星:《东盟国家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估:基本认知与决策咨询作用》,《和平与发展》2024年第4期,第125—157页;刘琳:《东盟应对大国博弈的战略选择及关于深化中国—东盟关系的思考》,《云南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第62—73页。

② 姜志达:《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当代亚太》2023年第4期,第71—93页。

③ 范宏伟、赵喆睿:《全球南方的地区主义:东盟的进程与经验》,《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3期,第33—57页。

④ 张洁:《推动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南海落地生根: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25年第2期,第18—38页。

⑤ 罗圣荣:《构建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历史经验与提升路径》,《当代世界》2022年第4期,第15—20页。

⑥ 王勤、赵雪霏:《论中国—东盟自贸区与共建“一带一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99—106页。

⑦ 卢光盛、赵皓童:《IPEF与RCEP:差异、影响及相关思考》,《亚太经济》2024年第4期,第10—17页。

⑧ 范佳睿:《推动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重要实践:中国与东盟交通基础设施合作分析》,《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6期,第62—77页。

⑨ 易鑫、尹响、王思佳:《西南民族地区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现状、挑战及对策建议》,《民族学刊》2021年第12期,第38—49页。

与地方性知识的深度结合,在方法论上更具多样性、灵活性与跨学科性。这种分化并不意味着东南亚研究和东盟研究的完全割裂,而是形成层次丰富交叉的学术生态。东盟研究并非也不可能简单取代东南亚研究,而是正在推动一种更具问题意识、政策相关性与理论自觉的新型研究范式的形成。

3. 南海问题与海洋安全研究。在该领域,前面提到的三类专家以及部分国际法专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在 21 世纪,特别是 2010 年后日益突出,该领域从早期的法理历史考证(如“九段线”的法理依据、历史性权利),迅速扩展到地缘战略、危机管控、海上规则制定、资源共同开发、海上执法合作等综合性安全议题。^① 学者们不仅关注中国与东南亚声索国之间的双边互动,深入分析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介入带来的复杂博弈^②,以及《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等地区机制建设。^③ 这一领域催生一批专门的研究中心,研究兼具高度敏感性和战略价值,是中国学界为应对复杂周边安全挑战进行深度知识生产的典型。

4. 东南亚国别与次区域深度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和企业“走出去”需求增长,对东南亚具体国家及湄公河次区域、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等次区域的精细化、立体化研究日益重要。现有研究超越一般性的国情介绍,深入对象国的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社会分层与族群关系、宗教文化思潮、法律法规与营商环境等具体层面。例如,对缅甸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进程、^④越南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⑤泰国政治周期与社会运动、^⑥印尼的伊斯兰与民主关系、^⑦新加坡城市治理模式^⑧等议题,都有持续而深入的研究。这种深耕弥补了早期研究宽泛粗疏的不足,为中国与各国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不可或缺的微观知识基础。即使是东帝汶这样的小国,华南师大早在 2021 年就专

① 叶淑兰:《南海地缘战略逻辑演进与南海命运共同体建构》,《世界地理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687—699 页;崔浩然、于向东:《海洋维权“民兵渔船国家责任论”:舆情认知与法理剖析》,《和平与发展》2023 年第 3 期,第 67—90 页;刘琳:《中国与东盟国家南海危机管控探析》,《国际问题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47—71 页。

② 宋伟、黄诗敬:《美菲海洋安全合作的发展态势及其局限》,《东南亚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95—118 页;鞠海龙、卢美帆:《从战术性渗透到战略性应对:日本南海政策分析》,《日本学刊》2025 年第 2 期,第 1—29 页。

③ 刘阿明:《东盟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立场的发展演变》,《东南亚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1—16 页。

④ 吴金平、景丽娜:《缅甸民主转型的政治困局探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96—115 页。

⑤ 徐秦法、徐云舟:《越南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逻辑探究》,《理论视野》2024 年第 5 期,第 84—91 页。

⑥ 庞卫东:《泰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历史启示》,《世界历史》2025 年第 1 期,第 29—37 页。

⑦ 王建凯:《政治民主化改革后印尼伊斯兰教的政治参与: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总统竞选经历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25 年第 1 期,第 65—71 页。

⑧ 余敏江、邹丰:《制度与行动者网络:新加坡环境精细化治理的实践及其启示》,《学术研究》2022 年第 7 期,第 44—51 页。

门成立了东帝汶研究中心。

5. 历史与语言文学研究。这是东南亚研究保持研究厚度与人文温度的基础领域。在历史研究方面,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编史传统,中国国别史、区域史专家善于利用丰富古籍文献与东南亚本土史料互证,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朝贡关系、贸易网络、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积累颇丰。近年来,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被赋予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这促使历史学者们更多地将研究与中国—东南亚关系、现代化、国际传播等当代议题联系起来。^① 区域国别学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东南亚研究与世界史学科之间的深度交叉,国际史、外交史、冷战史和区域史之间的隔阂被进一步打破。^② 在语言文学研究领域,除传统语言教学研究外,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关注持续升温,积极探讨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创作与流变。^③

李:您认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存在哪些不足?

翟:主要还是东南亚研究的系统性能力比较薄弱。一方面是国家整体学科建设能力仍需加强,包括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协同推进、综合保障等方面。这里重点谈一下基础设施能力的建设,比如数据库、知识库等。美国拥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盖洛普”(Gallup),新加坡拥有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中国则缺乏覆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调查机构,这导致中国学者倾向于开展定性分析或文献解读,社会调查和基于调查数据的定量研究方法有欠缺。

另一方面是研究者个体的综合能力需要大大提高。东南亚是世界上语言最多样化的地区之一,精通一门乃至多门东南亚本地语言,是进行高水平研究的先决条件。不少学者常能熟练检索并运用英文资料、发表英文文章,却缺乏“在地化”的洞见。^④ 我国不少高校开设东南亚语言专业,但课程多侧重语言教育,缺乏学术外语、专业外语和学术训练。更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地区政治生态复杂,部分国家对外国研究人员的活动,特别是涉及敏感社会政治议题的田野调查,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受限于语言、政治、研究议程差异等限制,也因为高校与研究机构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这导致中国学者参与国际

^① 牛军凯、周大程:《明清时期赴华身故越南使臣研究》,《古代文明》(中英文)2024年第2期,第132—144页;庞卫东:《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及其历史反思》,《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5期,第67—84页。

^② 张云:《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探索:冷战国际史与东南亚研究的交叉与融合》,《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5期,第68—88页。

^③ 朱文斌、岳寒飞:《中国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四十年》,《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第121—130页。

^④ Kankan Xie, “Experienc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 A Reverse Culture Shock,”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52, No.2, 2021, pp. 176-177.

学术会议的能力不强、积极性不高。

李:您刚才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成就评价相当积极,但同时又指出系统性能力薄弱、理论创新不足,您如何解释这种“量丰而质待提升”的现象?

翟:这个问题主要源自三方面因素。首先是对西方范式的依赖。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鉴和学习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使得西方范式在中国学界拥有天然的“合法性”和权威地位,能否熟练运用西方理论成为学术创新的一个中国要标准。这种惯性使得中国学者在研究东南亚时,不自觉地戴上了“西方的眼镜。且不论西方范式自身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国学者,长期在西方范式中“转圈”,很难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

其次,学术评价体系的“指挥棒”效应也影响了研究质量。当前主流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论文发表数量、项目级别等量化指标为核心,这种评价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产出,但也催生了学术研究的浮躁风气。学者们为了评职称、拿项目,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短平快、易出成果的题目,而回避那些需要长期田野调查、深厚理论思考的“硬骨头”。

最后,学科壁垒和制度性障碍带来的制约。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形成的按学科划分的院系结构和评价体系,限制了跨学科的合作。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以前,东南亚研究人员往往分散在历史、政治、经济、外语等不同学科,难以形成稳定、高效的研究团队,使得研究视角趋于单一,难以形成多元化的学术对话和知识共建。此外,一部分老牌东南亚研究机构正面临人才断层、学科转型等问题,而新兴的研究中心和智库虽然充满活力,却常常受困于编制、经费和场所等不稳定因素。

将当下的“量丰而质待提升”现象扭转为“量适质高”,需要学者、机构和政府的共同努力。随着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智库功能“三位一体”建设不断推进,目前存在的部分问题将能够得到解决。

三、国际比较视野中的东南亚研究

李:您刚才谈到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特色与不足,接下来想请您介绍一下西方及东南亚本土关于东南亚的研究,您如何看待西方学界的东南亚研究?

翟: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等国对东南亚的研究历史悠久,积累深厚。这里重点介绍一下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情况。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东南亚研究遥遥领先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研究的执牛耳者肯定是美国。1943年,英国

主导成立的“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South East Asia Command, SEAC)推动了东南亚概念的形成与传播。^①此后,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为对日作战雇用大量区域研究专家,其中,404支队的专家专门负责研究和搜集东南亚、锡兰(今斯里兰卡)及印度等地区的情报。^②1945年,美国国务院设立专门处理东南亚事务的办公室。以上种种军事与情报机构的设立,为战后美国开展东南亚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先发优势”。战争结束后,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对东南亚相关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直接推动相关研究快速发展。耶鲁大学在1947年成立美国首个东南亚研究中心,把东南亚的文化和民族作为整体进行跨学科研究。20世纪50年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康奈尔大学设立东南亚项目,开展对东南亚各国及整体的研究与教学。该项目涉及国家包括缅甸、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亚、菲律宾、越南和泰国。此后,这些国家便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界定东南亚地理范围的标准。冷战时期,一些名校纷纷设立东南亚研究机构。1965年越战爆发后,东南亚和越南两个名词在美国家喻户晓。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多由政府 and 军方资助,以政治学研究为主。196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美国东南亚研究者在学科背景上严重偏向政治学,许多人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效力。1951—1976年,共有680位研究者申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外国区域奖学金项目(SSRC 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其中,政治学方向的论文数量远超其他学科。相较于聚焦国际政治、政策制定与地缘战略的“应用型研究”,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基础研究”所占比例明显偏低。^③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在越南战争期间迎来高峰,但当政策需求下降时,学界对区域研究的关注程度随之下降。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军从印度支那撤出,东南亚不再成为美国的关注焦点,学术界对该地区的研究热情随之消退。1991年冷战结束后,美国区域研究的资金重新分配,在导致东南亚研究产出数量下滑的同时,催生东南亚研究走向“去政治化”。西方学者转向东南亚自身的价值,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理论视角,以更加学理化的方式审视东南亚的历史与现实,孕育出《革命时代的爪哇》《想象的共同体》等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

李:21世纪以来,西方的东南亚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

① 王丽敏:《中国和西方对东南亚称谓略考》,《东南亚纵横》2014年第1期,第61—65页。

② History Project, Strategic Services Unit,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War, *War Report of the OSS: the Overseas Targets*, New York: Walk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pp. 401-405.

③ Robert O. Tilman and Gerry D. Brewer, “Southeast Asia Specialists of the World: A Profile and an Analysis,” in Robert O. Tilman, *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Directory of Southeast Asia Specialists-1969*, Ann Arbor MI: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ter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Committee, 1969, pp. xii, xiv, xxiv.

翟:21 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学界对东南亚研究的兴趣愈发多元,视角更为多样,催生大量新的研究问题、方向及知识,主要有三大特点:

第一,推进理论范式创新与跨学科化。他们不满足于单纯描述区域独特性,而是将东南亚经验置于更宏大的全球资本主义与政治经济框架中加以理论化阐释。在理论方面推陈出新,利用威权自由主义、深度市场化、日常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新概念,尝试捕捉 21 世纪东南亚地区国家权力与市场逻辑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回应该地区政治经济形态的变化。^① 致力于将研究视角微观化,更多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经验,通过微观观察揭示宏大结构力量在具体社会实践中如何被重构、抵制或内化。这种微观视角转换丰富了研究层次,对东南亚社会的理解更立体。他们还推进跨学科方法的融合。传统上东南亚研究被视为多学科领域,而 21 世纪的研究则更注重知识论层面的整合,试图在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等母学科与区域知识之间构建更为紧密的对话,以提升区域研究在主流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这一跨学科化趋势与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变革相互呼应,推动区域研究寻求转型以应对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学术机构的改革。^②

第二,反思与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与非西方学者共同努力下,对传统知识霸权的批判已成为学界的共识。鉴于西方长期主导着东南亚知识生产,存在将西方经验普遍化、将东南亚客体化的倾向,学界呼吁构建一种更多元的知识生产模式,以摆脱对西方理论框架的依附。^③ 同时,“亚洲作为方法”(Asia as methods)等替代性研究范式的兴起,标志着研究取向的重大转变。部分学者主张挖掘亚洲内部的历史经验与参考点,通过亚洲国家间的相互参照来生产本土知识,以此挑战西方话语的垄断地位。^④ 除此之外,当下的研究者更加审慎地处理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反思西方理论在解释东南亚语境时的局限性。同时,尝试建立“互引”机制,即引用和重视东南亚本土学者的声音。这种伦理转向虽然面临诸多实践困难,但成为 21 世纪学术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研究对象的扩展与重心转移。他们将研究对象从国家和主流群体扩

① Joseph Nevins and Nancy Lee Peluso, eds., *Taking Southeast Asia to Market: Commodities, Nature, and People in the Neoliberal 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William Case, ed., *Contemporary Authoritarianism in Southeast Asia: Structures, Institutions and Agency*, London: Routledge, 2013; Juanita Elias and Lena Rethel, *The Everyday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② Vincent Houben, et. al, "New Area Studies 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The Way Ahead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for Asian Studies*, Vol.51, No.3-4, 2020, pp. 51-64.

③ Rommel A. Curaming, "Beyond Knowledge Decolonization: Rethinking the Internalist Perspectives and 'Progressive' Scholarship in/on Southeast Asia," *Situations*, Vol.10, No.2, 2017, pp. 65-90.

④ Mikko Huotari, et. al, eds.,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ractice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展至边缘群体、社会运动及非国家行为体,聚焦于移民、难民、劳工、女性等跨国流动群体。此外,区域合作与地缘政治变动成为新的研究焦点。东盟(ASEAN)区域身份的日益凸显及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促使西方学者深化对东南亚区域主义、地缘安全及大国博弈的研究,试图解析东南亚在中美竞争等全球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定位与自主性空间。^①另外,西方学者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关注急剧上升,拓展了东南亚研究议程。东南亚环境史研究逐渐褪去早期浓厚的殖民色彩,转而关注气候变化、资源管理、森林砍伐等当代议题,探讨环境问题与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层关联,彰显出西方学界对全球性危机的积极回应。^②

从总体上看,21世纪以来的西方东南亚研究在经历后冷战时期的短暂迷茫后,尽管仍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但通过理论创新、批判性反思与拓展研究对象,重新确立其在国际学界的主导地位。新的研究议题一方面释放出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批判力,但同时也使西方东南亚研究的碎片化特征愈发明显。由此可见,国家战略重视程度是区域研究获得可持续资源支撑的根本前提。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口头宣称重视东南亚,但资源投入并不到位。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削减科研经费,致使美国大学的众多文科院系和研究所面临裁员危机。由于西方对东南亚研究的重视程度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詹姆斯·斯科特先后于2015年、2024年逝世,两位学者的思想遗产和影响力跨越世纪,新一代学者难望项背。

日本的东南亚研究有鲜明的学术传统,整体水平较高。日本东南亚研究的跨学科协作和政策导向很有启发。日本国内研究机构的重组和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使得研究活动的重心从单一的学术探讨,逐步转向为对外官方发展援助(ODA)和地区安全议题提供学术支撑。日本学者在关注宏观地区格局变化的同时,非常重视实地田野调查和微观社会结构的变迁。比如,日本东南亚学会汇聚传统东洋史学者,以及精通印尼语、泰语等东南亚语言的青年学者,组成多元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日本学者能够大规模投身东南亚历史研究,主要得益于日本财团、文部科学省及丰田等企业财团的慷慨资助,政府、企业与研究机构共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日本学者获得学术资助的渠道畅通、资助力度较为稳定,能

^① Amitav Acharya, “The Myth of ASEAN Central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9, No.2, 2017, pp. 273-279.

^② Victor T. King, e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够在东南亚一国或多国进行细致深入的长期田野调查。^① 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CSEAS)强化跨学科研究模式,注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既做学术研究,也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出版《东南亚研究》(*Southeast Asian Studies*)等权威期刊。^② 此外,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下属绪方研究所的政策和实务导向突出,主要关注通过技术援助和经济合作促进东南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该所开展的印尼劳动力迁移政策、^③柬埔寨小额信贷等研究等^④,可以支撑对外官方发展援助的决策。

李: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全球南方”的崛起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东南亚本土的东南亚研究取得哪些新进展?

翟: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东南亚本土的研究者大多关注各自国家的具体问题。1968 年,新加坡成立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ISEA-Yusof Ishak Institute),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研究中心远程研究东南亚的局面。该所从 1974 年起出版的年度《东南亚事务报告》(*Southeast Asian Affairs*)学术价值很高,其主办的《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是东南亚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20 世纪 90 年代后,苏联解体、亚洲“四小龙”崛起及东盟十国形成,学术界掀起探讨“亚洲价值”(Asian values)的热潮,东南亚地区学者开始积极思考东南亚自身文明的独特价值。印尼学者赫扬托(Ariel Heryanto)指出,受西方认识论主导地位及西方学者“学术把关”的影响,东南亚学者在介入东南亚研究并获取与前者平等的地位方面面临诸多困难。^⑤ 21 世纪以来,东南亚本土的东南亚研究发展很快,地位上升,渐成特色,对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很有启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推动东南亚研究的主体性建构。在历史学领域,本土学者提出“马来性”(Malayness)、“南方视角下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 from a Southern per-

① Yu Insun,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Japan: The 1990s and 2000s,” in Seung Woo Park and Victor T. King, eds.,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73-111.

② Mario Lopez and Ayako Fujieda, “Evolving Historical Trends in Collaborativ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t the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SEAS),” *CEAS Newsletter*, 2020, No.78, pp. 14-19.

③ Kiyoko Saito and Firman Budianto, “Promoting Safe and Skilled Labour Migr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Challenges in Indonesia’s Labour Migration Polic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63, Issue 5, 2025, e70091.

④ Sovannroeun Samreth, et. al, “Financial Literacy Among Microfinance Borrowers: Its Importance and Determinants from a Household Survey in Cambodia,” *JICA Ogata Research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17*, Tokyo: JICA Ogat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2024.

⑤ Ariel Heryanto, “Can There Be Southeast Asians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ussons*, Vol.5, 2002, pp. 3-30.

spective)等新的概念框架,以及“时空尺度”等新的区域研究方法。^①有学者主张突破民族国家、区域、文化等传统研究范畴的束缚,将东南亚置于全球化视野下进行考察,深入分析移民、资本、思想、商品、身份认同及边界的流动性。^②东南亚通过东盟大学网络(ASEAN University Network)、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历史与传统区域中心(SEAMEO CHAT)、东南亚研究区域交流项目基金会(SEASREP Foundation)等不同平台进行深入研究与合作,推动本土东南亚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二是提升东南亚本土知识生产的地位。东南亚的区域学术机构的能力建设显著增强,形成本土学术共同体并发挥重要作用。除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外,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ASEAN-ISIS)、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的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以及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清迈大学,越南社会科学院、越南外交学院,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老挝国立大学、老挝外交学院,缅甸仰光大学、缅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MSIS),柬埔寨合作与和平中心(CICP)等高校与机构纷纷加强东南亚研究,活跃于国际东南亚研究界,是本土东南亚研究的中坚力量。

三是推进跨国学术网络。一些国际名校均设有与东南亚研究相关的课程与研究项目^③,如康奈尔大学、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剑桥大学、伦敦亚非学院、印第安纳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西方高校。一批著名的东南亚本土学者都曾在西方国家长期学习并从事研究。他们将西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带回东南亚,积极推动本地学术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同时,本地区的东南亚研究学术网络不断拓展,上述许多机构通过提供培训、奖学金和交流项目,有效推动东南亚研究。

虽然本土东南亚研究的力量正在崛起,但西方国家在这个领域仍占据主导,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在科研机构数量、研究人员规模及研究成果质量上,依然明显领先,这一格局还很难打破。

^① Vincent Houben, “The New Area Studies and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Dorisea Working Paper*, Issue 4, 2013, pp. 1-9.

^② 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in H. G. C. Schulte Nordholt and R. Raben,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Leiden: KITLV Press, p. 282.

^③ Victor T. King, “Who Made Southeast Asia? Personages, Programs and Problems in the Pursuit of a Region,” *Suvannabhumi*, Vol.12, No.2, pp. 157-200.

四、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方法、路径与机遇

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经验来看,科学研究经历从严格的学科划分到跨学科研究兴起的演变。在您看来,交叉学科研究的兴起如何影响东南亚研究?

翟:为深入了解东南亚地区,研究者不能仅局限于单一视角,而应将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立体全面地认识东南亚。在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过程中,处理的问题不仅仅是单一领域的,还涉及生活和交往的方方面面,很多问题既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文化族群问题。研究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历史学能帮助人们理解殖民遗产的影响,民族学和人类学关注族群认同和矛盾,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设计和精英之间的博弈,而经济学考察产业结构的变迁,学科交叉有助于较为完整地理解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必须用交叉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东南亚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学者普遍意识到的发展方向,积极主张以区域国别学建设为契机,推动政治、国际关系、经济、历史、民族等不同学科的融合。^①可以预见,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交叉性刚刚起步,但将会不断加强。需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学者是东南亚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国际关系学在东南亚的交叉学科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结构现实主义可溯源于结构实在论,自由主义理论汲取经济学的启示,建构主义理论直接源自社会学和传播学中的认知论。代表性学者如阿米塔·阿查亚将东盟的独特互动模式与建构主义理论相融合,把区域主义从被动的制度结构转变为由规范和身份建构驱动的主动过程,推动东南亚研究的理论创新。

李: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兴起比较地区主义,这对中国东南亚研究平衡好地方性知识与一般性知识有何启示?

翟: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不论国家大小,其功能和本质都是一致的,国家间的互动构成国际结构,而这种结构又决定国家的行为。这一过程不仅具备可解析性,而且呈现出永恒不变的特质。因此,研究特定区域或国家的作用相对有限,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通过同一套理论进行解释,单位本身并没有特殊性。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地区合作的兴起,以新区域主义理

^①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东盟研究课题组、翟崑:《以东盟学为先行示范点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33页。

论、安全复合体理论为代表的区域理论不断拓展,说明地球是个“地区构成的世界”。^① 世界上各个地区均具特殊性,不同地区在历史背景、语言文化、地缘特质、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无法依靠同一套理论来理解,故而,研究者有必要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挖掘每个地区独有的地区性知识。因此,在一般性知识和地区性知识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东南亚研究的成果似乎仅能用于解东南亚本身,难以推广至其他地区并构建新的一般性知识。欧洲研究、非洲研究等领域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比较地区主义兴起,旨在将区域视为一个内聚的整体,并通过比较研究方法来分析不同区域间的制度和效果,以期揭示更具普遍性的规律和因果关系。一部分学者还从纵向上对全球化、国内政治与地区秩序之间的关联进行微观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研究层次的整合,证明比较地区主义方法研究在纵向上的立体包容性,使跨地区比较有更丰满的内容。^② 国外学界在运用比较地区主义方法研究东南亚地区方面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③ 对中国学界,比较地区主义能够在一定程度是解决理论“普遍性”和地区“特殊性”的矛盾:研究者既可以通过探寻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共性,从“特殊性”中找“普遍性”,也可以通过比较研究来分析现有理论对不足,从“普遍性”中找“特殊性”。近年来,比较地区主义引入国内学界。以耿协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积极推进,于2023年翻译出版了《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中文版,并发表了不少学术文章,其中包括有关东盟、东南亚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④ 截至2025年,“比较地区主义圆桌论坛”已经举办五届,成为国内比较有影响的国际关系与地区主义论坛之一,其中第五届正是在暨南大学这一东南亚研究传统重镇举办的。相比国外,尽管目前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运用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方法的论文、专著仍然较少,但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李:在您看来,“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翟:在国际关系学百年纪念之际,阿米塔·阿查亚和巴里·布赞呼吁破除“西方中心论”,主张发展真正体现国际性的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他们的目标不仅要突破西方主流理论的局限,还要把世界各地、

①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耿协峰:《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议程与未来挑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4期,第116—127页。

③ 代表作如 Louis Brennan and Philomena Murray, eds., *Drivers of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Europe and Asi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④ 耿协峰、陈灵芝:《超越“欧盟中心主义”: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的进展》,《欧洲研究》2025年第3期,第32—60页。

各种文明,以及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和互动都搬进研究里,特别是不能忽视“全球南方”那些独特的文化。全球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学者愈发重视对东南亚本土思想资源的挖掘。比如,吕振纲、王琛等学者深入剖析古代东南亚具有圈层结构的区域秩序即“曼陀罗体系”,发现古代东南亚国家通过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曼陀罗中心”,实现与中国的和谐共生^①，“曼陀罗思想”至今仍在战略文化层面影响着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实践。^②张帆、杨潇剖析古代东南亚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多中心政治形态及其权力运作方式即“尼加拉体系”,指出其构成一种新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且在阐释古代东南亚国际关系动态与变化方面,相较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及“曼陀罗体系”更具说服力。^③张云系统分析马来西亚学者法里什·努尔(Farish Ahmad-Noor)的思想,认为其东南亚历史书写方式和对西方学界“东方主义”的批评性结构,在当下为“全球南方”的史学发展提供重要借鉴。^④由于在地性不足,中国学界对东南亚本土思想资源的挖掘主要依托二手文献资料。但是,有理由相信,更多学者投身其中,新的原创性成果将不断涌现,持续拓展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领域、边界,并提升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

李: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请您从该学科建设推进者的角度谈谈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

翟: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属性是“交叉在地、学用相生”。“交叉在地”意味着该学科是典型的交叉学科,鼓励通过长期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在地化认知;“学用相生”指区域国别学是为国家战略需求服务的,研究者不能脱离国家战略需求导向。这一属性有助于弥补我国东南亚研究在交叉性和在地性方面的不足。

交叉性是指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交叉,要求研究者打破固有的学科思维定式,以问题为中心来组织研究。研究的起点不是用什么方法,而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需主动学习并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而构建能解释复杂现实、具有整合性的新分析框架。为实现真正的交叉性,有学者提出,区域国别学应倡导“田野调查+”方法。若说交叉性是方法工具箱的拓

① 吕振纲:《曼陀罗体系:古代东南亚的地区秩序研究》,《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8期,第27—39页。

② 王琛:《“曼陀罗思想”对印尼外交政策的影响:战略文化的视角》,《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1期,第69—88页。

③ 张帆、杨潇:《尼加拉体系:理解东南亚国际关系的新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89—116页。

④ 张云:《来自“南方”的历史思考:法里什·努尔的东南亚史研究及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6期,第30—39页。

展,那么,“田野调查+”便是获取真实养料的重要途径,其旨在获取深度、质性的在地知识或本地知识,并有机整合其他多种研究方法,实现优势互补。^①比如,可以将某个田野点获得的发现,用多学科方法加以检验,从而提炼更具一般性的结论。詹姆斯·斯科特在马来西亚吉打州水稻主产区进行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深入研究农民的日常生活。他结合民族志和农业领域的研究方法,揭示农民通过“弱者的武器”进行日常反抗的普遍理论,这一理论颠覆学界对农民政治行为的传统认知。^②

“学用相生”明确区域国别学视野下东南亚研究的价值导向和根本使命,旨在打破学界与社会之间的“两张皮”现象,构建一个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生态。这要求研究成果必须超越学术圈的内循环,实现外循环,主动走向更广阔的应用市场,为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不同用户群体提供有价值的知识产品。优秀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其成果清单中不仅应该有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还应该包括决策咨询报告、媒体评论文章、通俗读物,乃至将影视作品、电子游戏和新兴媒介纳入研究领域。如此,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将可以突破书斋局限,化作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知识纽带,在助力国家发展、推动区域共同繁荣的进程中,彰显自身的学科价值与社会尊严。

五、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未来展望

李:展望未来,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努力方向是什么?

翟:未来五到十年,展望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方面,从国家层面。任务是明确学术定位,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之间实现良性互动,构建彰显中国特色、蕴含亚洲智慧的标识性和原创性理论,追赶国际前沿水平;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共同促进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摆脱对西方概念、理论与范式的过度依赖,突破西方学术霸权,并驾齐驱,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另一方面,从个体层面,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者既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定力,又要有“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现实关怀。这无疑是个巨大挑战。

前面提到的“交叉在地,学用相生”,是对历史经验和最新发展趋势的总结,也是中国东南亚研究迎接未来挑战,实现更大跃升的发展路径。就“交叉在地”而言,西方学术界较早建立跨学科研究框架,高水平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在长期发

^① 朱文珊、吴浩:《“田野调查+”:论区域国别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国际论坛》2025年第2期,第116—133页。

^② 叶成城:《调查研究与因果解释: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刍议》,《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4期,第116页。

展中形成相对成熟的跨学科培养模式,力求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法有机整合,形成对区域社会的多维度理解。西方学者在东南亚地区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积累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培养大量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本土学者,使东南亚学界与西方学界形成千丝万缕的关系,反过来又为西方学者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提供新助力。就“学用相生”而言,西方的东南亚研究源于殖民时期与冷战时期的战略需求,这一历史背景使其自诞生起便具备强烈的实用功能,尽管重视程度有所下降,但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形成的紧密知识输送网络仍维持着良好运作。本土的东南亚研究也在学用相生的路径上实现了较好的发展。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在实现“交叉在地,学用相生”方面有巨大提升空间,需要凭借国家力量,发挥好学术共同体的作用,推动东南亚研究的整体跃升。

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机制。可以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建设为契机,不仅要加强人文社科内部的“小交叉”和“传统交叉”,也要推动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大交叉”和“前沿交叉”。需要国家从制度层面保障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和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同时,应建立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有组织科研模式,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形成持续攻关的研究机制;进而探究百年变局下东南亚研究的核心议题:东南亚地区格局的变化、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趋势、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及南海问题、区域治理、可持续发展、民族宗教、科技文化等。鉴于当前学术评价体系常以单一学科标准衡量研究成果,这不利于交叉学科研究发展,因此,需探索构建适应新特点的评价机制,为交叉学科研究者提供合理的学术激励与发展空间。

提出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这需要加快推动从“外来者视角”向“在地者视角”的认识论转向,建立基于实地调研和本土经验的在地知识体系。包括在地化数字教育资源开发框架的构建和应用,以及在地化教育理念下的地理野外考察实践活动教学模式的探索。此前已提及,西方学者已开始批判将东南亚视为“他者”和“客体”的视角,而中国研究者在追求在地化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警惕“中国中心主义”,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理解和阐释东南亚社会。为此,要改变走马观花式的调研模式,鼓励高校、研究机构设立田野点,支持研究者深入东南亚社会生活的具体场景,长期扎根,形成对东南亚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的真切认知。应加强与东南亚国家本土学术机构及学者的合作交流,构建平等互利的学术伙伴关系,在合作研究中学习本土学者的知识视角与研究方法,推动中国学者与东南亚本土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共享与共同成长。

健全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双向互动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强化学术研究

的问题导向与服务能力,紧扣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发展需要设定研究议程,避免研究陷入空泛与边缘化。中国东南亚研究向来有服务国家战略的优良传统,“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南海问题等,为研究成果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与政策需求。关键在于如何将政策需求转化为有深度的学术议题,在服务战略的同时提升研究的理论品质;另一方面,应加快完善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对接机制,构建高校、智库、政府部门、企业等多主体协同的知识生产体系,畅通学术成果向政策转化的渠道,使研究成果能够及时高效地服务于国家决策与社会发展。当前,部分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体系对政策研究和应用成果的认可度不高,抑制研究者参与政策研究的积极性。因此,需探索建立能够平衡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多元评价机制。

加快推动中国东南亚研究“走出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长时段交往,孕育了独特的互动模式,有助于为中国学者提出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思维。需要将经验素材转化为中国、东南亚和西方学界接受与认可的理论话语。中国学者应更积极地投身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在与西方理论和本土知识的交融中,培育自身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构建具备普遍解释力和理论张力的分析框架。推动学术出版生态的国际化进程。应建立包括国际各方在内的学术共同体,提供更多国际平台和公共产品。当前,老牌期刊与新兴期刊(集刊)共同构筑多元化的出版平台,但整体国际影响力尚显不足,有必要引导这些期刊向国际化、现代化方向迈进,如加强数字化建设,提升研究成果的可读性与传播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品牌和公共产品。